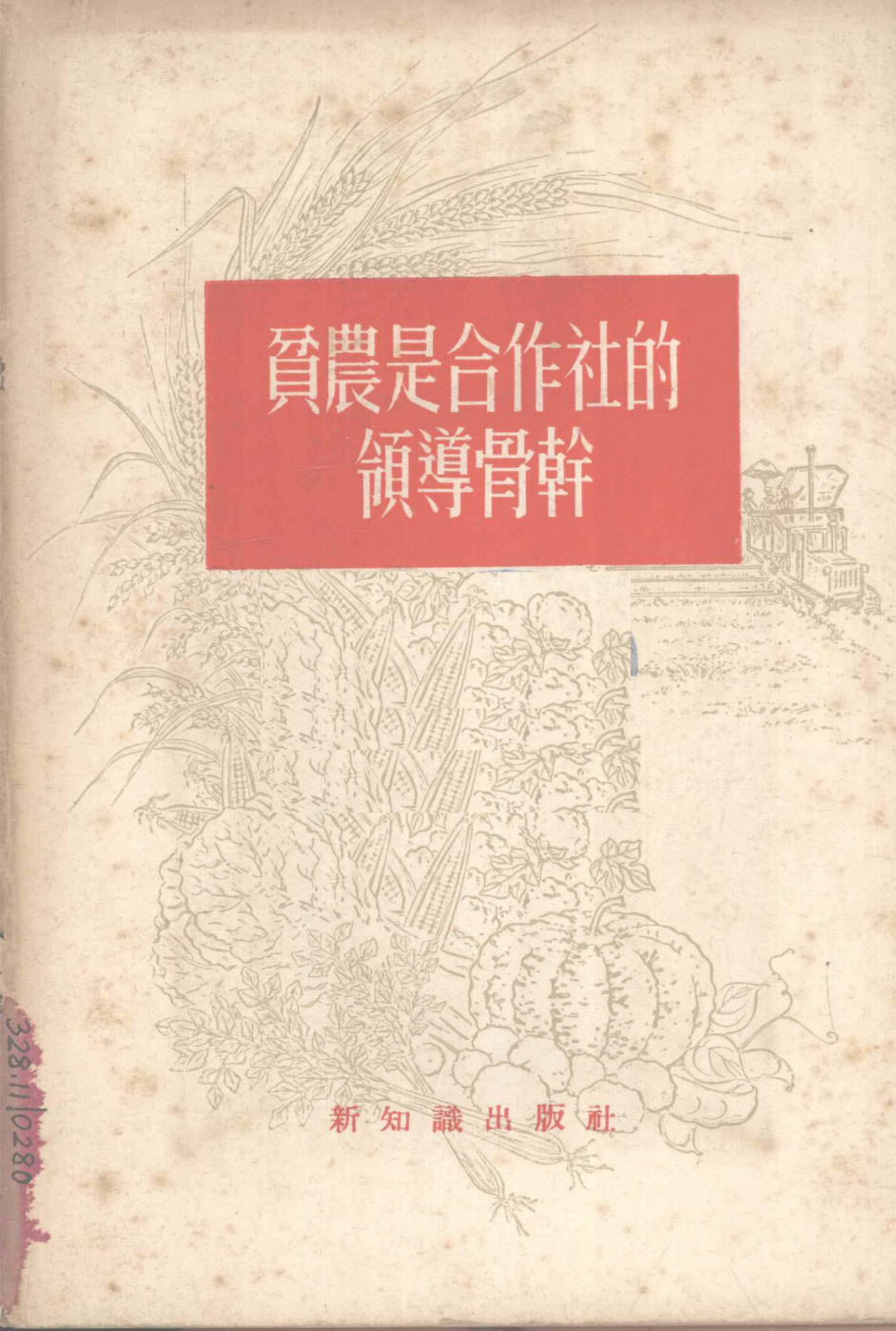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tailed line drawing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stalks of grain, ears of corn, and pumpkins.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illustration of a tractor with a person operating it.

貧農是合作社的 領導骨幹

新知識出版社

328.11/0280

貧農是合作社的領導骨幹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內 容 提 要

为了保证農業合作化运动健康的發展，必須坚决地依靠貧農和下中農。本書选編的文章共十一篇，突出反映了貧農和下中農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好合作社的典型范例。書中以鮮明生动的事实，說明了貧農是農業合作化运动的核心領導力量，只有緊緊地依靠了貧農和下中農，才能鞏固地團結上中農，才能使全体勞動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实现党对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貧農是合作社的領導骨幹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号

上海錦章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2 字數：32,000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1,000本

統一書号：T3076·39

定 价：(5) 0.12元

办社必須依靠貧農和下中農

黎 言

为了保証農業合作化运动健康的發展，必須坚决地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可是，究竟为什么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为什么不能依靠富裕中農，这对某些党的農村工作人員來說，还是一个沒有完全解决的疑問。因此，他們在办合作社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喊的是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实际上作的却是依靠富裕中農。这种現象，在河北省丰潤縣一九五四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你要走到農村，就会听到对富裕中農的称讚，說他們“能說、能寫、能算”，說他們“牲畜好、農具好、經營好”，說他們“好依靠”“好領導”。同时，也可以听到对貧農和下中農的貶責，說他們“生產無力、領導無能、統購無糧、統銷無底”，說他們入社是：“少牛沒車地不肥，兩肩只抬一張嘴”，說他們“不好依靠”，“不好領導”。有不少党的農村工作人員，一听说富裕中農入社，就十分欢迎，認為富裕中農多了，社就減少了困难；一听说貧農和下中農入社，就有点發愁，認為貧農和下中農多了，社就增加了負擔。也有不少党的鄉支部，甚至党的区委會，当一些資金困难較多的社請求國家帮助的时候，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为什么不多吸收几戶富裕中農？”結果，在一九五四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農和貧農分別建社的情况相当嚴重，富裕中農佔領導优势的社大量出現。在二千一百八十二个新建社中，富裕中農佔領導优势的社就有四百零七个，而且还有五十四个社的成員全部是中農，沒有一戶貧農。如果說富裕中農“好依靠”“好領

導”的話，這些社該是問題最少巩固最容易的社了，可是事實却作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凡是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社和清一色是中農的社，恰恰是問題最複雜、也最難解決的社，恰恰是巩固不很容易、垮台却很容易的社。所有參加過一九五五年整社工作的幹部，對這一點有最深切的體會。在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四百零七個社中，就垮了一百五十八個，還有一百一十六個是經過徹底整頓改變了領導成分以後才巩固下來的。在清一色是中農的五十四個社中，垮了的就有四十六個，現在勉強維持下來的八個社，有的要合併和改組還不能避免垮台。這是什麼原因呢？請看事實。

岔河鄉的岔河村有一個十戶的社，其中九戶是富裕中農，一戶是貧農。由於這九戶富裕中農都想佔別人的便宜，又怕自己吃虧，因而在“互利”問題上經常發生糾紛，區委書記親自去整頓仍然不能解決，最後只好宣佈解散。散社的那天，九戶富裕中農十分高興，他們說：“單幹有吃又有穿，何必入社找麻煩”。而那戶貧農卻向區委書記直掉淚，他說：“我少牲口，缺農具，只有九畝地，原指望入社翻翻身，誰知道社又垮了，我怎麼辦呢？”這九戶富裕中農為社垮而高興和這一戶貧農為社垮而傷心的事實，不正是對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社“垮台容易巩固難”的很好說明嗎？

有些富裕中農還不僅僅自己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甚至有意要把合作社弄垮，來證明社會主義道路是不能走的。比如楊匠莊鄉趙莊第二社，十六戶中有八戶老富裕中農，社主任和會計都是他們，他們不是設法把社办好，而是搞垮。這個社的主任和會計，當然都是“能說、能寫、能算”的“三能”者，而就是這個“能算”的會計把作了八個工的記成十個工，把作了十個工的又記成八個工，故意挑起社員的不滿，造成社的混亂，而當社處在

这种境地的时候，这个能說的主任就說了：“人家說社会主义道路好，对，咱就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你們看，社会主义道路好是好，就是咱們走不了。”这个主任和这个會計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說明某些資本主义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对合作化的抗拒嗎？我們要是依靠他們办社，社怎么能够巩固呢？

当然，有些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合作社也巩固下來了，甚至也增加了生產。那末，是不是这些社就沒有問題了呢？不，其中有些社的問題还很多，而且很嚴重。首先，有些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社公开地对國家的糧食統購工作進行抵抗。比如鄭庄子鄉鄭庄子村共有三个社，第一社和第二社是貧農佔領導優勢，第三社是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当村里的糧食統購工作开始以后，第一社和第二社用一个上午就估實了產量，並發動社員連夜趕打，很快就把應該賣給國家的糧食全部賣給了國家。而第三社却用种种隱瞞和欺騙的办法，企圖少賣給國家糧食。糧食工作組只得一方面採取个别發動这个社的貧農的办法，揭露真實情况，另一方面親自下地檢查作物株数，六个幹部花了二十二天的時間，才把產量算實。原來第三社隱瞞了的產量相近實產量的四分之一。可以想像，我們要是依靠富裕中農办社，國家的糧食統購任务能够順利完成嗎？

其次，不少富裕中農佔領導優勢的合作社普遍發生了不服从國家作物种植計劃的現象。比如左家塢鄉扣家寨村被富裕中農掌权的社就是这样。这个社共二十一戶，富裕中農就佔了十二戶。今年春耕的时候，國家分配給这个社的植棉任务是十九畝，同时要求每畝產量达到一百斤。这个社的确在十九畝地里种了棉花，但他們种的不全是棉花，而是一壠白薯，一壠棉花，只注意經營白薯，不注意經營棉花。結果，白薯每畝平均產量超过村里產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棉花每畝平均產量却比村里產量低

了三分之二。这个社主任还得意地说：“棉花長不好，那是國家的，白薯長得好，这是自己的。”可以想像，我們要是依靠富裕中農办社，國家的生產計劃的實現会有什么保証嗎？

最后，富裕中農在耕作技術上的保守思想是更加牢固的，他們对農業技術革新是不容易接受的。韓城鎮寨子村第一社兩個生產隊兩種播種豆子的情况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今年春播時節，这个社的管理委員會根据支部的決定，要各个生產隊播種豆子的時候改簇播為條播。第一生產隊的隊員多數是貧農，隊長也是貧農，他們執行了管理委員會的決定，全部豆子實行了條播。而第二生產隊的隊員多數是中農，隊長也是中農，却没有執行管理委員會的決定，全部豆子照样還是簇播。而且这个生產隊長還在隊員中間散佈对这种技術革新的不滿。他說：“扯蛋，我種豆子種了几十年，还没听說過什么條播，照样沒少產。”結果怎样呢？兩個隊的施肥數量、田間管理完全一樣，第二生產隊豆子的每畝平均產量比第一生產隊的少收了四十九斤。可以想像，我們要是依靠富裕中農办社，農業的技術革新不是只会放慢不会加快嗎？

事实是这样清楚，在合作化运动中，我們要是依靠富裕中農的話，实际上只能依靠他們去發展資本主义，而不可能依靠他們建設社会主义。富裕中農的“牲畜好、農具好、經營好”好不好呢？的确很好，办合作社也的确需要这种“三好”。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去團結他們，領導他們正确地發揮“三好”作用，要这种“三好”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而不是为資本主义自發勢力服务。事实也証明，凡是依靠了貧農又團結了中農的合作社，富裕中農的“三好”就会變成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

那末，一年來貧農和下中農办社的情况怎样呢？事实作了

完全肯定的結論，凡是貧農和下中農佔領導優勢的社或者成員全部是貧農和下中農的社，都是問題比較少、有了問題也好解決的社，都是容易巩固的社。丰潤縣一九五四年建立的社中，有三百九十一個社的成員大部分是貧農，小部分是下中農，沒有一戶富裕中農。一年來只垮了四十二個，而其中的二十三個是由於領導上不給支持甚至宣佈解散才垮的。剩下的三百四十九個社，的確遇到了很多困難，但這些困難沒有嚇倒他們。缺少牲口，他們就用人力來代替；缺少資金，他們就賣掉婦女的首飾，賣掉祭祖的供器；有的社員口糧不夠，他們就在社員中設法調劑；不會辦社，他們就在辦的中間學習。這些社在黨的領導下都堅持下來了，而且辦好了，几乎是社社增加了生產，戶戶增加了收入，成為貧農一定能夠把社辦好，辦好必須依靠貧農的活的榜樣。我們只舉韓城鎮河西村第一社來作一個例子。這個社原來共四十六戶，其中貧農三十六戶，下中農六戶，富裕中農四戶，領導這個社的主任也是貧農。除掉四戶富裕中農，其餘四十二戶几乎是村里的貧窮戶。春節還沒過，就有十九戶缺少口糧。這時，社里的確很困難，既要解決生產上的困難，又要保證缺糧戶有糧食吃。四戶富裕中農看到這種情況，害怕自己吃虧，就堅決要求退社了。這樣一來，這個社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窮棒子社”。就在富裕中農退社的當天，大家表示：“人家退社能拉車能牽牛，咱們退社連根牛毛也帶不走；咱們可堅決不能退社，咱們要富在社里富，窮在社里窮，死在社里死！”困難越來越大了，播種缺種，上糞缺糞，開始只是人沒糧吃，以後牲畜也沒草吃了。麥收前一個月缺糧戶增加到二十七戶，麥收前幾天，缺糧戶增加到三十七戶。所有這些困難，憑着大家的團結一致，憑着主任的日夜操心，終於克服了。誰料到，正在秋收的時候，主任得了重病，臥床不起。鎮上的支部書記耽心主任病了、這個社會出問

題，就到社里去檢查和幫助。出乎他的意外，社里的勞動熱情極高，生產秩序極好。社員們向支部書記表示：“我們要‘地不丟穗，場不丟粒’，保證完成秋收任務。”經過秋收分配，全社收入大大增加。原來有十九戶常年缺糧戶，現在只剩六戶部分缺糧戶。原來這個社的缺糧戶要國家供應一萬一千多斤糧食，現在除六戶部分缺糧戶由社內調劑解決而外，還可賣給國家一萬一千多斤余糧。

事實證明，貧農和下中農所以貧困，絕不是因為“生產無力”，而是小農經濟使他們無法擺脫貧困，一旦組織起來，他們就會在生產上發揮無盡的潛力。事實也證明，貧農絕不是“領導無能”，只是由於沒有鍛鍊的機會，使他們的才能被埋沒着，只要把合作化的担子放在他們的肩上，他們就會顯示出出色的領導才幹來。事實也證明，貧農絕不是“統購無糧，統銷無底”，只要組織起來，貧農就一定會由缺糧戶變成余糧戶，不但不要國家供應，還可以用自己勞動的果實，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實還證明，貧農雖然“少牛沒車地不肥”，但是憑着他們兩隻勤勞的手和一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強的心，絕不會增加社的負擔，反而會給社創造更多的財富。事實更證明，貧農正因為貧困，才真正是“人窮志不窮”，才真正具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積極性，正像毛澤東同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的：“對於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因此，他們才是合作社的中堅骨幹，他們才是合作社的領導力量。因此，合作化必須依靠他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確，經過一年來合作化運動實踐的檢驗，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依靠貧農和下中農這一真理已經顯得格外光輝。豐潤縣的各級幹部在這一實踐的檢驗中，受到的階級路線的教育，是這樣深刻和豐富，生動和有力。這就使

他們更容易領會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決議和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的精神，因此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對合作化運動的領導就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絕大部分幹部在建社和整社中都已懂得了階級分析的重要，運用了階級排隊的方法，貫徹執行了黨的階級路線。在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運動中，已經消除了中農貧農分別建社的現象，也基本上克服了中農佔社的領導優勢的現象，在五百七十七個合作社的八千六百五十五名社務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中，貧農佔四千八百四十六名，下中農佔三千零二十九名，上中農只佔七百八十名。

無數經驗證明：只有緊緊地依靠了貧農和下中農，才能鞏固地團結上中農，只有既依靠了貧農，又團結了中農，才能逐步限制和消滅富農，也才能使全體勞動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黨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窮八家变成了富大社

北京日報記者 丁 紫

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北京市丰台区新發地鄉的陈留村由貧農和下中農办了一个八戶的小型農業生產合作社，从此，这颗社会主义的火种，放射出了無數的火花，燃遍了全鄉。这八家中有五戶貧農、兩戶下中農，他們都是生產上生活上有困难的戶，另外一戶農民虽然土地、勞力、牲畜都不缺，但是因为沒有資金，年年也搞不好生產。八家組織到一起以后，选出刘慶常做社主任、王云峯做副主任。

听说村里有名的窮八家組織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村里人議論紛紛，有人笑得直不起腰來。好多富裕戶說：这八家是窮瘋了，搞什么社，簡直是瞎胡鬧！上中農刘振奎的老婆向入社的親戚王云峯說：“云峯啊！你瞧着事不好，就赶快撤腿，農業社还長得了嗎？”但是，随便这些人怎么說，怎么笑，这八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却沒有絲毫动摇。

社主任刘慶常把他們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向区委会作了彙報。区委認為全区第一年試办社，沒經驗，基礎差，怕搞不好影响不好，不大同意他們搞社。但是窮八家坚持要办社，有的說：“打早就搞过插秧換工(劳动互助)了，到現在已經到搞社的时候啦！”有的說：“东西都归一堆了，一塊劳动勁头大，不要再分开了。”这样，区委也只好同意了，並且經常派人去帮助解决生產和組織上的問題。为了慎重起見，区委沒有同意他們叫農業生產合作社，暫時叫做“高級互助組”。社員們說：愛叫什么

就叫什麼吧！

向困難進軍

春耕開始了，這個“高級互助組”在生產上遇到了很多困難。全社有七十來畝水旱地，只有一頭騾子一頭老驢，畜力不足，農具也不全，肥料、籽種更不夠。社員們家里底子空，有的把頭年留的籽種都吃了，誰都沒錢投資。這時候，社外多少人為社擔心！但是困難難不倒他們，他們決心向困難進軍。社員們鼓足勁來說：咱們非把社搞好不行！春旱的時候，牲口不夠用，他們用三個勞動力推水車澆地；農具不夠用的時候，王雲峯就到处去奔走，借了王家的鎬頭，又去借張家的鐵鍬。這樣東拼西湊，总算把春耕生產第一步困難解決了。可是接着又發生了生活上的困難。社員呂廣揚、谷永金家里沒糧食吃，起初還想放下社里的活，到外面打些短工掙點零錢買糧食，可是這樣會耽誤社里的活，於是大家就三斤二斤的互相調劑着吃。後來大家都沒多少糧食了，王雲峯就向親戚借糧食，轉借給大家。最後他們得到了政府的借款，接着就到了夏收季節，生活困難獲得了解決。全社夏季土豆每畝產到二千二百斤，小麥每畝平均產到一百八、九十斤。和村里生產條件最好的戶差不多，除了交給國家借征的小麥外，每戶都分得了二、三百斤小麥吃。這是窮八家多少年來都沒有見過的豐收。大家生產熱情更高了，他們把夏季絕大部分收入又都投入秋季生產。接着秋季的大白菜、糧食、花生又都獲得了豐收，每戶一年的收入都夠吃夠用。這些眼前擺着的實際成績，堵住了那些富裕戶的嘴，再也沒人說他們笑他們了，從此，“窮”字和這八戶社員分了家。

這時候，區委正式批准他們的“高級互助組”為農業生產合作社了，並且在村里建了黨，吸收了劉慶常、王雲峯、谷玉亭為黨

員，加強了對社的領導。

三年來，社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了一九五五年春天，全鄉已經有三百九十一戶入社。初辦起大社，困難又來了。春耕的時候，社里缺少資金。這時候黨支部研究決定，先由社員投資解決。於是，貧農、下中農老社員積極帶頭投資，這個投一百元，那個投二百元，有的把打算買自行車的錢、把準備蓋房的錢或者買布的錢都投到社里了；單幹的時候還是負了好多債的貧農蘇金生，入社一年以後就能投資二百二十元。這一來，社里資金問題解決了多一半。一九五五年秋天，社里準備蓋冬季種植蔬菜的溫室，但是沒有木料，原來的貧農魏廣福、蘭秀榮等十几戶把自己私有的木料投入社內。原是下中農的吳德林等二人把準備蓋房的木料投入社里，這樣社里就蓋了八十二間溫室，節約了四千多元的開支。

學會了管理生產

他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從成立的時候起，就形成了貧農、下中農的領導核心。庄稼漢沒有領導大生產的經驗，但是在實際生產中，這些困難也被逐漸克服了，黨支部和社管理委員會摸索出了一些經營管理的經驗。

在組織社的头兩年，社里還多是按照小農生產的習慣，吃什麼種什麼，不能按着國家計劃安排生產，不注意因地制宜的種植，把土地種得挺零散，難於管理，常常丟活。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社領導幹部接受了這樣的教訓之後，每年在春耕播種前幾次召開黨支部委員會、社管理委員會、社員大會周密研究種植計劃，讓它既要服從國家計劃，又要因地制宜和便於管理。由此產量也就一年比一年提高。

起初社里訂的生產計劃，不大注意按照季節安排使用勞動

力，因此在办社之初，社里常常發生劳动力过多或不足的問題。劳动力多了沒活幹，窩工；少了活又幹不过來，生產受損失。以后，社里每次在訂种植計劃的同时，也按季、按月、按小段訂出用工計劃，根据情况，随时調整。比如每年秋菜种植和收穫季節活茬总是比較緊張，社里就及时作准备，能提前幹的活尽量提前，同时，准备出一些突击力量，並且大力發动妇女去完成。今年虽是三百九十一戶的大社，秋季种的又是菠菜、又是白菜、又是蘿卜、又是雪里紅，……但是生產仍然在有条不紊地進行，什么菜都沒受損失。

党的政治思想和社的經營管理水平也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提高的，遇到一个問題，解决了这个問題，就積累些經驗。随着社的發展过程，社在劳动力分配上是由死分死記，改成死分活評，后来又逐步採用按件記工和小包工的办法。在实行按件記工以前，幹同一种活茬的強、弱劳动力的工作效率相差不多；实行按件記工后，在許多活茬上，強劳动力工作效率要比稍弱的劳动力經常高出一倍，甚至还要多。这說明社的生產效率也是逐年提高的。

站在对敌斗争的前列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獲得廣大貧農、中農的爱戴，同时也遭到了富農的仇恨。每次全鄉开羣众大会的时候，富農分子和坏分子就开小会。富農分子王永寬說：“等我們翻过身來，这些幹部有一个算一个，一刀一刀割他們的肉。”这些情况都被貧農谷玉亭(黨員)及时掌握了，並且向党支部、社管理委員會作了彙报，党支部和社管理委員會分配他負責注意富農的活动。有一天，鄉里又开羣众大会，谷玉亭在会場上一看王永寬沒來，於是他赶快就去調查。果然不出他所料，王永寬正在利用这个机会

破坏生產呢！他把社里的壟溝剷毀了十二丈！谷玉亭扭着王永寬就到了当地派出所，加上王永寬平日的破坏活动，司法机关馬上依法逮捕了王永寬。

大家都富裕了

新發地鄉建社四年，人們越來越富裕了，只是一九五五年春季就有二十二戶蓋了九十多間新房子。有几十戶老社員夏天大人都有雨鞋穿，冬天大人、小孩都有絨衣穿。因為社里小麥產量每畝達到二百三十斤，除去政府借征小麥和賣給國家一部分外，每戶可淨分三百斤左右，許多戶經常能吃到白面。除去幹活的時候，社員們穿破衣服的是少見了。年年穿不上整齊棉衣的李相洲，今年一家人都穿上了里面三新的棉衣。社員們的生活都一年比一年富裕了。

社已經像一塊吸鐵石似的吸引着未入社的農民。最近全鄉又有二十多戶報名入社，全鄉只有一戶中農沒入社了。新發地鄉已經變成了一個合作化的鄉，徹底挖了窮根的鄉。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日報”）

由八戶到一百零六戶

——記幸福農業生產合作社八戶貧農堅持辦社的經過

李 希 齡

幸福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安徽省肥西縣七十埠鄉人所共知的“八大貧”(即八戶貧農)堅持辦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社在辦社的第一年，碰到了重重困難，由於八戶貧農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終於把社壯大並鞏固起來。

*

*

*

一九五三年冬季，七十埠鄉袁家才農業生產合作社增產的消息傳遍了全鄉。黃老郢子很多農民在老社增產的影響下，積極要求辦社。當時，以葛德才、張良和為首的一些中農，受了合作化潮流的推動，也準備把互助組轉為合作社。但他們怕貧農入社會佔“便宜”，所以組織時便撇開貧農，單單找中農入社。而中農本來入社決心就不大，到了處理具體問題時都是針尖對麥芒，誰也想佔些便宜，結果合作社沒有組織成功。以張書柱、張書發為首的七戶貧農，是真心想辦社的。這七戶貧農，土地改革後雖然分得了土地，但是缺牲畜、缺農具，生產上和生活上都有困難。他們原先想和中農葛德才等聯合起來辦社，誰知中農不帶他們，只好單起“鍋灶”了。

七戶貧農積極要求辦社的情況，傳到了鄉支部。支部決定派關塘稍郢子共產黨員王興發(貧農)去加強領導。王興發愉快地接受了支部交給的任務，當天就去訪問了七戶貧農，和他們研究如何把社办好。研究時大家都充滿信心地說：“支部派黨員來

領導我們辦社，我們一定下勁幹，不管有多大困難，決不說一句冤枉話。”困難就是缺牛缺水車。於是王興發一面申請鄉政府批准貸給一條牛，一面向老社主任袁家才學習辦社經驗。經過評產入股，幸福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成立了。

到了第二年春耕的季節，有牛有犁戶都去犁田了。而政府答應貸給社里的一條牛還沒有買來。社員看着秧田里的秧苗已經有一寸多高，本田還沒有犁過，真是干發急。這時候，有些落後的農民就說開俏皮話了：“人家社里田不犁是留着養蛤蟆（青蛙）呀！”社員們一方面等着牛來，一方面積極想辦法克服困難。過了三天，牛買來了。第二天雞還未叫，社員們就牽着牛去犁田了。結果，社不但提早完成了春耕任務，還幫助單幹戶鹿全海耙了十七畝田。

栽了秧，有的人仍然看不起這個合作社，如中農張振亮說：“連只水車都沒有，到秋後不減產才怪呢！”有一次，社主任王興發去向中農張良根借水車。他家房簷下明明閒放着一架水車，却不借用。後來還是政府幫了忙貸給了三十二塊錢，買了一部新水車。秋收以前，社里有些社員生活發生了困難，怎麼辦呢？社主任王興發就把自家養的一只豬賣了，借給四戶斷炊戶十六元。社員張良友、張書發等也把磨粉和織布賺來的八十塊錢，全部借了出來，由社統一借給困難戶使用。由於社員們發揚了友愛互助的精神，春荒、夏荒都安然度過了。

秋收到了。社里的稻子增產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產量普遍比社外高。全社一百零三畝稻田，平均每畝收四百四十斤，最高的收七百斤。社員王良貴和中農凌思明兩家田搭界，往年王良貴的田要比凌思明的田少收四、五十斤，而去年却比凌思明的田多收了五十斤。割稻時，中農凌思明向王良貴的田里瞄了好久，只說社里生產有“竅門”。社里生產有沒有“竅門”呢？有。